

胡风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集外编Ⅲ

第7卷

顾问

巴 金 王朝闻 贾植芳 王元化

全集策划

王建辉 刘鼎华

整理辑注

梅 志 张小风

常务编辑

魏世弟 沙铁军

各卷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

王建槐 邓宁辛 沙铁军 祝祚钦
谢嘉星 魏世弟

第7卷责任编辑 沙铁军

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 汪 汉

责任校对 余兆伟

责任印制 杜义平 王铁兵

照片手迹技术处理 朱永锴

本卷为“集外编”的第三编,系作者自1979年恢复自由后所写,并经整理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

现按内容及时间顺序分为五辑:

第一辑为对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回忆、感想及问答等。

第二辑表示的是对几位老友及故人的悼念和纪念之情。

第三辑中的一些随笔,包括了感怀、祝愿和为友人作品所作的序跋等。

第四辑为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回忆和总结,对自己作品所作的说明及对自己文艺思想的阐述等。

第五辑为作者最后所写的长篇回忆录,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未及写完,作者便去世了,后半部由夫人梅志根据作者生前的手稿、日记及书信等材料续写。

其中,前四辑中的多数文章已收入《胡风晚年作品选》(1987年1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第五辑定名为《胡风回忆录》,于1993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第一辑

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	3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	10
鲁迅书信注释	18
就有关鲁迅作品答客问	35
一点回忆	38
若干更正和说明	41
《写在〈坟〉的后面》引起的感想	47
鲁迅先生	57

第二辑

致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唁电	127
悼萧红	129
我的悼念	134
《七月》作者与海燕书店	137
悼念江丰同志	142

目录

难忘的哀思	146
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	151
纪念赖和先生	153
悼念天蓝同志	157
深切的怀念	160

第二辑

读雷抒雁诗《小草在歌唱》随感	169
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172
为《晋驼短篇选》说几句	174
“进入”到中国大学的上空来了	176
斗争的青春	178
革旧迎新五愿	181
介绍两位台湾作家——杨逵和吕赫若	184
我与萧军	187
我读路翎的剧本	190
《徐放诗选》序	198
喜投神圣的一票	201
我的祝愿	202

第四辑

我的小传	207
我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关系	214

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	216
我做的一些中日文化交流工作	220
关于延安文艺传统	227
《工作与学习丛刊》始末	231
“形象的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	235
略谈我与外国文学	241
《胡风评论集》后记(存目,见本全集第三卷)	
对“五把刀子”的一点解释	265
《胡风译文集》几点说明(存目,见本全集第八卷)	
《胡风杂文集》几点说明(存目,见本全集第四卷)	
我为什么写作	269

第五辑

回忆录	273
1 东京时期	275
2 在上海	293
3 在武汉	355
4 重庆前期	394
5 奔赴香港	511
6 在东江,在桂林	542
7 再返重庆	577
8 重返上海	643
编写后记	711

胡风全集

第一辑

关于鲁迅“转变”论 的一点意见^①

对鲁迅的战斗历程,多年来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有人说,二十年代末,创造社和鲁迅的论战(鲁迅自己把那叫做“围剿”)逼得鲁迅不得不表示拥护共产党,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持这种看法的人们中有的甚至说,鲁迅是主张屠杀青年的法西斯主义者。所以把那次论战的结果叫做鲁迅的“转变”。这种看法是直接违反以至否定鲁迅的实际的。

去年秋(?)我被通知去听了一位文艺工作领导人的报告录音。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参加文艺界的集会,是关于新文学史的看法的报告。其中关于鲁迅只提到两点。其一是,鲁迅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其次是,鲁迅是在创造社的“批判”的压迫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收入《胡风晚年作品选》(1987年1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下才学了马克思主义的。他提出的证明是,鲁迅在《三闲集》的《序言》里说过,是那些“批判”使他(挤得他)读了马列主义的。前者给鲁迅一个空洞的“旗手”名称,完全不接触鲁迅本人的劳动在当时以及直到现在的伟大的战斗意义。这且不谈,我也没有条件和能力谈。关于后者,我以为报告人是直接违反了鲁迅的实际的。鲁迅原文是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这是说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并没有说他的全部思想“转变”。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创造性的解决,不但不能据此就断定这以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这正是总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应有的结果。报告人把用马克思主义做引导解决了具体文艺问题,作为鲁迅当时和那以前不懂以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证明。这恰恰是直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人说鲁迅说得“很清楚”,其实是他把原话改得很不清楚了。报告人这种论断是直接歪曲了鲁迅原文的。鲁迅原文说的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解决了具体的文艺问题,而报告人却说是创造社逼得他学了马克思主义。当然的推论是鲁迅以前没有学过马列主义,那以前鲁迅的战斗中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样,就用以证明了鲁迅转变论的正确性。这是对原文不负责任的态度,因而他的断论是违反历史实际的。

那么,鲁迅的思想发展是否经过转变的过程呢?是经过了。在本世纪初,他提出了建立“人国”的理想。但他能找到的思想是欧洲资本主义没落的哲学思想,例如“超人”论等,虽然鲁迅把它改造成了革命的武器,要在普通人的斗争中达到“立人”的目的,但这

种理想是唯心的,当然找不到实践的道路。但十月革命后,他的理想就从唯心论转到了唯物论。他看到十月革命胜利了这个“事实的教训”,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这就把创立“人国”的理想和“立人”的过程放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去实现了。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事实的教训”,他就把理想从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的立场上面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转变。接着的五四运动,他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建立“人国”的道路,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实现“立人”的目的,不再是本世纪初他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提法了。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人民革命的过程里面了。

关于他的这个转变的情况,最确切的说明还是鲁迅自己的话。在随感录五十九,题为《圣武》的后面,他提出了简要的确切的说明。

他把中国残酷的阶级统治,把那残酷性叫做“来了”(统治者的刀与火),只有在和这种残酷(“来了”)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立人”的改造过程,进而实现建立“人国”的理想。他的说明如下: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就是这样迎接了十月革命的。

一、他说的各种“外来的思想”实际上是指当时在中国开始了的社会主义运动说的。这种革命，在俄国已经胜利了。

二、他说的“有主义的人民”是包括革命领导者和有组织的人民以至其它无组织的劳动人民说的。他这种思想是超过了当时一切革命者的认识的，是符合毛主席从宣传、组织到行动的群众路线的大原则的。

三、他这种认识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他把十月革命看做“新世纪的曙光”。

四、他说的“物质的闪光”，是指当时“实业救国”、武器救国，搞官僚买办阶级的立宪国会，完全脱离历史实际和脱离人民的那些思想说的。他所确信的是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他号召人民向“新世纪的曙光”抬起头来。这足以说明他的战斗是为革命，但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教师”的地位上，只是由衷地希望人民的觉醒，并不是用超出于群众的领导者说话，他自己也只是群众的一员，不过是对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某些点上认识得较早而已。这是人民领袖的最宝贵的品德。

另外，我们还应该认识他当时的社会条件。

《新青年》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总领导。在这里，对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是一个严肃的历史任务。执行这个任务的，是李大钊、鲁迅，以及陈独秀等。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在这里有李大钊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专论。鲁迅发表了《药》和几篇杂文，前面说过的《圣武》就是其

中的一篇。不能不说,鲁迅是这个专号最有力的作者和组织者。上面介绍过的《圣武》最后的话,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庄严的宣言。

去年《成都日报》有一则短的介绍文,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李大钊对鲁迅甚为钦佩。对他的子女说:鲁迅更和我们一致了;现在你们不懂,将来应该向鲁迅学习(大意)。即此可见,鲁迅在那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甚至是超过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之上的。自然这不是说:从五四以后,鲁迅对所有政治社会文艺问题的看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这里不过是就他的思想主导倾向而言。

再补充几点。

(一)鲁迅在这一段还指出过“……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外来思想“实没有插足的余地”。当时,鲁迅就把时间空间两个概念当作客观物质世界的特征,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的天才卓见。而这只能是他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研究中体会到的思想成果。

(二)李大钊是从日文、英文了解俄国革命的。在和旧世界作斗争的鲁迅,绝不会不从日文书刊了解苏俄的情况。不同的是,鲁迅完全用自己的语言从事斗争,没有采用革命口号做宣传。作为文学家,这正是鲁迅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他伟大之处。正是李大钊,他深刻地理解到了鲁迅所作的斗争的伟大意义。

(三)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新青年》,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这里团结作战的。鲁迅是同人之一,《新青年》的战斗纲领,当然是得到了他的支持的,而且,他是积极地作了斗争。不过他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从特殊达到一般的。和当时李大钊等

的斗争是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

(四)事实说明了,二十年代末鲁迅由于创造社等人的“批判”才进行了思想“转变”,这种意见是不能成立的,是违反了鲁迅的实际的。

(五)那么,怎样解释三十年代鲁迅自己说他五四时期的创作是遵照了先驱者的命令,是遵命文学呢?他这正针对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的,以领导人自命的人们说的。他说的是,他的文学道路,五四时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他说的先驱者指的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革命者,尤其是他自己说的。他说的遵命是指他自己的由衷的精神要求说的。在五四的十多年后还说在鲁迅精神里还有一个思想“转变”问题,那完全违反实际,不过是批判者们冒充无产阶级代表发出的“官话”而已。

(六)看一看他对苏联文学的态度,问题就更加明白了。早在一九二五年,他介绍了苏联的文学论战和其它文学理论,一九二六年介绍了《十二个》和以后的《白茶》等文学作品。他对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对作家叶赛宁和当时来过中国的同路人作家皮涅克的批判等,他对苏联文学有了当时别人没有达到的理解,并做了热心的介绍。不过,他用的是一个作家的印象,而不是运动发起者的语言罢了。他是苏联文学最早的介绍者。目的是为了拥护苏联,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说二十年代末鲁迅身上还有过一个思想“转变”过程,那完全是违反历史实际的。

至于说,五四以后,鲁迅对苏联文学,对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拥护的态度,是在他的著作中贯串着的一条红线,这其中是值得作深入的研究的。

至于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后,鲁迅的思想经过了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深刻化,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和“转变”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例如,在党诞生的同年写的《阿Q正传》,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今天,都是有教育意义的。这不过是一例而已。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

附记:鲁迅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的“事实”,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以为指的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一系列政治反动说的,似乎在文字上这样提过。这是错误的。我在一九四六年作了更正。在鲁迅诞生百年的今天,由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前进,应该开始做些还革命的先驱者鲁迅以本来面目的工作。

和社会隔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我,不知道关于鲁迅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自己,除了脱离社会以外,还患有各种病症,连写字都非常困难,没有(包括鲁迅著作在内的)任何材料,无从做任何研究。但想到两年以来,关于鲁迅“转变”问题又一再被提了出来。在自我批评的意义上写了这点备忘录材料。不知能否供认真的研究者作参考,完全凭模糊的记忆,如果我在这里犯了新的错误,那当然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同日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 若干回忆^①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是磨豆腐的,母亲是童养媳。我后来用胡风这个笔名,就因为我母亲姓胡。

一九二九年秋我到日本,对外身份是拿官费的庆应大学学生,实际上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我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左联东京支部。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并不多,我记得我当时只参加过一次会议,出席者有任钧、谢冰莹等人。我当时通过左联成员韩起与冯雪峰通信联系,但没见过面。一九三二年底我曾回国一次,才认识了雪峰,记得那时左联书记是丁玲。

一九三三年我因从事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政府逮捕,住了三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1期,后被收入《胡风晚年作品选》。——编者注

个月牢，七月初被驱逐回国。^①回到上海后，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找我谈话，要我参加左联领导工作，担任宣传部长，我同意了。那时茅盾还是左联书记，但二、三个月后，他就辞去了书记职务。周扬又找我谈话，让我接替茅盾担任左联书记。茅盾一九二八年去日本，写了《从牯岭到东京》，被创造社、太阳社批得很厉害。他一九三〇年回国后，由于雪峰的关系加入了左联。丁玲被捕后，他接任左联书记。一九三三年《子夜》出版后，他在左翼文坛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其实他在担任书记职务期间，没做什么具体工作，只召开过几次会议。

我担任左联领导职务后，曾向文委（左联党团的上级领导）负责人阳翰笙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但他并不热心，所以我后来也就算了。

我当左联书记后，周扬自己兼任宣传部长，任钧担任组织部长。一九三四年七月任钧被捕，周文接任组织部长，周扬也不再兼任宣传部长，由任白戈接任。我当左联书记将近一年，一九三四年秋末冬初，由于穆木天被捕后告密，我不能再当左联书记了。有一次，我在沙汀家里见到周扬，就向他提出辞职，他同意了。左联书记后来由田汉接任。我辞职后，周文也离开了。

我担任左联书记期间，左联工作是由周扬、任钧和我三人商量决定的。开会地点就在我家里，他们两人经常来我家。任钧被捕后，左联工作由周文、任白戈和我三人商量决定，开会地点改在周文家里。周扬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① 此处作者记忆有误。实际被驱逐回国日期应是6月15日回到上海。——编者注